

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

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
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
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中央苏区 革命文化 史料汇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江西省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 编
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

江西人民出版社

(赣)新登字第001号

书 名：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
作 者：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办公室编
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办公室
出发版：江西省人民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行 版：江西省人民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22.5
字 数：55万
版 次：1994年10月 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
定 价：14.00元
ISBN 7—210—01358—X/K·151

邮政编码：330002 电报挂号：3652 电话：8331534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在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粤北的一大片红色区域内（即中央苏区）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巨大变化。其结果，诞生了一种新的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由于这种新的文化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土地革命战争）的炮火硝烟中诞生的，是在中央苏区的红色区域内发展起来的，因而称之为中央苏区革命文化。

中央苏区革命文化，作为一种新的革命的意识形态，不仅生动地反映了我们党领导下的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的特点和人民群众崭新的精神面貌，而且在继承“五四”运动革命传统的基础上，开辟了我国新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它在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井冈山革命精神和光荣革命传统，已成为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处于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中国人民，大力弘扬苏区的革命文化，继承和发扬苏区军民的光荣革命传统与革命精神，对于进一步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繁荣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大力弘扬苏区革命文化，同时也为了以苏区的革命文化史料作为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给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和现代革命文化史研究工作者提供宝贵的资料，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于1989年，在江西瑞金召开了闽浙赣湘鄂川黔七省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协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征集工作五年规划》，并确定由江西省文化厅、福建省文化厅、浙江省文化厅、湖

北省文化厅、湖南省文化厅在1994年底以前，协作完成《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闽浙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湘赣、鄂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等三部文化史料汇编。本书是三部汇编之一，由江西省文化厅、福建省文化厅协作完成。

《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汇集了从1929年前后至1935年间，中央苏区党、政、军和文化教育部门发布的有关文件及宣传材料，中央领导同志和苏区有关方面负责人发表的重要文章或讲话，中央苏区的文化社团和广泛开展的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中央苏区的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中央苏区的新闻出版工作和博物馆工作，建国后发表的有关中央苏区文化艺术活动的回忆录以及对中央苏区文化艺术界一些知名人士的介绍文章，等等。此外，还附有中央苏区文化运动大事记和建国以来已出版（或报刊上发表）的研究中央苏区文化运动的著作、论文及有关资料的目录索引。

《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汇集的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绝大多数是从各地档案馆、博物馆、革命纪念馆复印来的，少数是从有关书籍和报刊上抄录来的。这些珍贵的史料，从一个侧面记叙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军民所走过的光辉战斗历程，真实地反映了苏区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获得翻身解放以后，进而要求在文化上获得翻身解放、享受新的文化生活的迫切愿望，体现了中央苏区的革命文化建设和广泛开展的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的鲜明的革命性、强烈的战斗性和广泛的群众性。这些珍贵的史料雄辩地证明，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建设，离不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不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谋求自身解放的斗争中，要战胜阶级敌人并从敌人手中夺取政权和巩固人民自己的政权，除了必须依靠手里拿枪的人民军队之外，还要有一支文化的军队——这是革命人民用以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革命的文化（包括文学艺术）一旦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便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能够发挥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

敌人的巨大战斗作用。

为了收集中央苏区的革命文化史料，我们用了数年时间，在各地查阅了中央苏区的革命文献以及中央苏区出版的各种报刊资料。尽管如此，我们至今还未能搜集到中央苏区的全部革命文化史料。这是因为，毛泽东、朱德同志从1929年率领红四军进入赣南、闽西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到现在已有半个多世纪了，许多资料已散失；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多次军事“围剿”，使苏区的许多革命文化资料遭到毁坏；当年中央苏区出版的报刊，今天即使找到了也往往残缺不齐（就连中央档案馆保存并复印的《红色中华》合订本也有缺页）；有些报刊只知其名不见其物，如1934年5月出版的《苏维埃文化》杂志第一期（上面载有瞿秋白撰写的论述苏区文化战线文章、李伯钊创作的剧本等），只在《红色中华》上见到报道出版的消息及其目录，一直没有找到原物。为此，我们期望全国各地档案馆、博物馆、革命纪念馆的同志们和广大读者，若发现本书尚未收集的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请及时提供，以便增补、充实。

收集、整理和汇编革命文化史料的工作，是一项思想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我们在收集、整理和汇编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对收集到的史料一一进行认真的鉴别、核实，然后分门别类加以整理、编排（各个部分的每一份史料，均按其产生的时间先后次序排列）。为了忠实于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于一些因受当时“左”倾路线影响而在思想观点方面有明显错误的史料，我们亦予以收入。此外，有些史料在文字表达方面较粗疏，语句欠通顺，我们均不作改动，以保持史料的原貌。我们对原文中明显的错别字用〔 〕更正，漏字用〈 〉填补，因印刷模糊不清或因纸张破损而无法辨认的字则用□代替。

本书脱稿时，正值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我们谨以此书表达对毛泽东同志的缅怀之情。

限于水平，编辑、注释等方面可能存在不少缺点，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3年12月26日

中央苏区革命文化运动概述

中央苏区，又称中央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辟的最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它的地域范围主要包括江西的赣南、福建的闽西和闽赣粤边的江西省、福建省、闽赣省、赣粤省、赣南省30多个县。从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等率红四军挺进赣南、闽西开辟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及党、政、军中央机关举行长征，有五年多时间。在这期间，中央苏区的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二、三、四次“围剿”，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大力的改革和建设，从而使工农红军日益壮大，苏维埃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苏区的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革命根据地也不断扩大。

由于苏区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翻身解放，因而进一步要求在文化上获得翻身解放，于是在中央苏区便出现了群众性的革命文化艺术运动，这一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苏区人民在文化战线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必然结果。中央苏区的革命文化，便是在这一广泛的群众性运动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

中央苏区革命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弱到强的过程，具体可分三个阶段。

一、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到古田会议的召开，是中央苏区文化初创时期。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在红军和根据地的群众中，开始了革命文化活动。当时，红军除同国民党的军队打仗外，还要

做地方群众的发动工作。为提高宣传工作的效果，红军开始运用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支援革命战争。

红军在初期宣传工作中仍认为宣传工作是一部分人的事，只是贴几张标语。后来建立起宣传员制度，红军到达一个县城，只要几小时，宣传工作就可以铺开。群众说“红军一到满地红”。编歌是一种常用的宣传形式。1928年8月，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编一首《告湘南各县工农兵群众歌》，第一段写道：“工农们来士兵们，铲除土豪要除根。土豪劣绅真可恶，压迫工农不当人”；最后两段写道：“工农们来士兵们，豪绅压迫记在心。穷人只有路一条，土地革命第一程。大家努力向前干，本党誓作领导人。努力努力复努力，最后胜利归我们”。歌词通俗易懂。有着很好的宣传作用。1929年1月，以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名义发布的布告《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就是用92句四言诗写的。这个布告，以通俗的语言，将红军的宗旨表述得清清楚楚。在这时期，红军和地方苏维埃政府还编写了许多歌颂红军和革命领袖的歌谣，如《三湾来了毛司令》、《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等。由此可见，苏区的宣传文化娱乐活动，一开始就植根于红军及工农群众之中，形成鲜明的革命特性。

二、从古田会议至全苏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是中央苏区文化发展时期。

1929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福建古田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为大会起草的决议案。《决议》的第四部分，对红军的政治宣传工作作了深入的分析 and 总结，指出了过去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今后政治宣传工作的路线和方法。《决议》中说：“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红军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这个工作的第一步，就是从理论上纠正官兵中一般对工作及宣传队轻视的观点。‘闲杂人’、‘卖膏药’等等奇怪的称呼，应该

从此取消”。《决议》要求各级政治部主动积极地把艺术股和士兵委员会的俱乐部健全和充实起来，“地方政府选派进步分子参加红军宣传队”，各部队应从士兵中挑选优秀分子为宣传员；在宣传的方式方法上要多种多样，“应该把全军绘画人才集中工作”，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情绪的革命歌谣”，演戏和化装宣传是“最具体和最有效的宣传方法”；提倡编写士兵教育课本，把革命故事、歌谣、画、报纸作为教材，鼓动群众开展演戏、打花鼓等各种文娱活动。《决议》下达后，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更加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起来，部队和地方的一些俱乐部、宣传队出现了向专业化发展的明显趋势，文艺演出和创作的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中央苏区文化运动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茁壮成长的新时期。

古田会议后，有的部队开始组织业余的戏剧组织，集中艺术人才开展较大规模的演出活动。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问题决议案》规定，“区政府、县政府、闽西政府应组织文化委员会，计划各种文化教育之进行”，要求“各区乡应尽可能开办阅报社、俱乐部。各县应组织新剧团，经常出发表演新剧”。193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更明确规定，“发展俱乐部（唱歌组、演剧组、足球组、拳术组），组织游艺晚会，是苏区内较为适合的宣传鼓动形式”，要求各地广泛运用这一宣传武器。

由于红军部队、地方党委和苏维埃政府以及各群众团体都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因此，这个时期的中央苏区群众性文化活动发展较为普遍，效果也较好。1930年10月，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给党中央的综合报告中写道：“苏府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及各种革命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强的，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

头禅……每逢纪念节日的文明新剧、革命小调，都普遍的有。……”刘士奇的报告，是对这个时期中央苏区文化工作的生动总结，表明苏区的文化活动已走向成长发展的阶段。

1931年秋，在瑞金成立了一所红军学校。红军学校是培养军事干部的摇篮，也是当时开展文艺活动的中心。红军学校俱乐部设有戏剧管理委员会，由校政治部指定伍修权、赵品三、李伯钊、危拱之、蔡纫湘等组成，负责组织热心文艺活动的同志进行创作和演出。红军学校几乎每周都有晚会，每次晚会都要演戏、唱歌、跳舞。不久，在这些同志活动的基础上组建了“八一剧团”，后又组建了“战士剧社”。为庆祝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演出《父与子》、《打土豪分田地》等剧，罗瑞卿、肖华等同志都参加演出。“战士剧社”还在黎川的三都演出由李卓然编剧、罗瑞卿导演的话剧《庐山雪》和由聂荣臻指导编剧、罗瑞卿导演的话剧《八一》。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会期间，由李伯钊、胡底、钱壮飞等组成的文娱小组，组织红军学校机关的一些文艺活动分子，演出钱壮飞改编的《最后晚餐》和李伯钊根据《黑人吁天录》改编的《农奴》，受到代表和瑞金群众的欢迎。这标志着中央根据地的文艺创作活动，正由业余走向专业、由初创阶段向发展阶段迈进。

三、从1931年11月“一苏大”召开到1934年红军主力北上，是中央苏区文化繁荣时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文化活动也进入到一个繁荣的新阶段。

在这个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苏维埃政权文化教育领导机构已健全。中央政府设有教育人民委员部，下设社会教育局、艺术局、编审局等文化职能机构。社会教育局和艺术局协同管理文化艺术和社会文化工作。省、县教育部设文化科、社会教育科，负责管理俱乐部、戏剧团体、报纸、书报阅览所、图书馆、博物馆等。

1932年5月，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文化教育工作决议》，要求“各级政府应协同群众团体，以十二万分的努力，发展群众的和儿童的文化教育”，要“普遍在各乡建立俱乐部”。1933年7月，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发布《怎样去领导俱乐部列宁室工作》一文，对俱乐部如何办墙报、如何组织晚会，都提出了具体要求。1932年9月工农剧社筹备委员会通过《工农剧社章程》、1933年4月15日经人民委员会批准颁布《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1933年4月23日教育部颁布《区乡村俱乐部组织系统与工作任务》、1933年6月教育部颁布《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在总结各地兴办俱乐部、工农剧社经验的基础上，于1934年4月颁布了《俱乐部纲要》、《工农剧社简章》、《苏维埃剧团组织法》、《红军中俱乐部列宁室的组织与工作》、《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组织与工作大纲》，同年9月28日又颁布《儿童俱乐部的组织与工作》条例，并把这一系列的工作条例纳入教育法规付诸实施。

这个时期的中央苏区各级文化领导机构健全，文化工作被纳入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施政大纲，文化活动生机勃勃。据1934年9月29日《红色中华》发表的《苏区教育的发展》一文记载：“到今年三月为止，在中央苏区的江西、福建、粤赣、瑞京等地，据不完全统计，我们有……1917个俱乐部，参加这些俱乐部文化生活的固定会员，就有9万3千余人。在各种机关团体中，文化生活成了工作人员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每个组织都附属有自己的列宁室，进行群众的文化教育工作”。毛泽东同志在1934年1月24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关于“苏维埃的文化教育”中说：“现在的苏维埃区域，虽然是处在残酷的国内战争环境，并且大都是过去文化落后的地方，但是已经在加速度的进行着革命的文化建设了”，“根据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在2931个乡中，有俱乐部1656个，工作人员49368人”，“苏区群众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我们看报纸的发行也可以知道。中央苏区现在已有大小报纸34种，其中如《红色中

华》，从3千份增至4万份，《青年实话》发行2万8千份，《斗争》2万7千1百份，《红星》1万7千3百份，证明群众的文化水平是迅速的提高了。苏区中群众的革命的艺术，亦在开始创造中，工农剧社与蓝衫团的运动、农村中俱乐部运动，是在广泛的发展着”。这一切，充分说明了中央苏区文化艺术的繁荣景象。

—

中央苏区的文化运动，是在毛泽东、张闻天、瞿秋白、徐特立等的重视和关怀下发展起来的。

1928年夏，在龙源口战斗中俘虏了很多国民党士兵，毛泽东就特意要何长工编支新歌来教育敌军士兵。何长工用旧调编了六段歌词，第一段是：“国民党是反革命，保护土豪和劣绅，欺压穷苦工农士兵，哎呀呀，哎呀呀！受苦工农士兵起来闹革命。”最后一段是：“毛委员坐镇井冈山，领导我们打胜仗，井冈山呀星火燎原，哎呀呀，哎呀呀！井冈山呀星火燎原。”这首歌当天就向大批俘虏兵演唱，取得很好的效果。许多俘虏兵痛哭流涕控诉反动派，要求参加红军、调转枪口打反动派。

1929年1月红军第四军在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率领下，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份共92行，每行4字的琅琅上口的诗化式布告——《红四军司令部布告》，文字通俗，明白易懂，做了很好的宣传工作。

1929年4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三纵队到兴国，住潯江书院的文昌宫。他在书院的魁星阁接见劳苦工农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又在书院崇圣祠主办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亲自讲课解释《十大政纲》，课余休息时教学员唱《工农革命歌》：“我本是一工人，数千年痛苦都受尽，家里多么贫，工厂去谋生。时间延长，工资减少到如今。一天到晚真辛苦，满身血汗都流尽。打倒帝国主义，推翻资产阶级，若不这样做，永远做奴隶。……”

在领导的重视和带动下，红四军的文化宣传鼓动工作丰富多彩。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古田召开第九次共产党代表大会。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决议案第四部分，对红军的政治宣传工作作了深入的分析 and 总结，明确提出今后政治宣传工作的路线和方法。《决议》被通过下达后，从部队到地方都把文艺宣传工作当成“第一重大的工作”，各种形式的文艺宣传活动更加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起来。这不光是在部队中，农村也一样。毛泽东在1933年写的《长冈乡调查》中说，长冈乡“全乡俱乐部4个，每村1个。每个俱乐部下都有体育、墙报、晚会等很多的委员会，每村一个墙报，放在列宁小学。十篇文章中，列宁小学占八篇，群众占两篇，俱乐部都有新戏”。同年在《才溪乡调查》中说，上才溪乡有“俱乐部1个，任俱乐部工作的50多人，内新剧团占30多人，墙报4处，每村1处，在日校门外。文章学生教员做得多，群众做的不过十分之一”；下才溪有“俱乐部1个，工作人员50多人，墙报5处”。从这两篇调查中看出，当时的文化运动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引下，已经开始向工农方面发展，开始和工农相结合，并且有了很大的成绩。

1934年1月24日~25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又特别强调指出：“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还在列举中央苏区34种大小报纸和《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的发行量分别为4万份和两万八千份后说：“苏区中群众的革命的艺术，亦在开始创造中，工农剧社与蓝衫团的运动，农村中俱乐部运动，是在广泛的发展着。”并提出苏维埃文化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群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

1933年1月，张闻天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他当时主持中央日常

工作，很重视苏区文化运动同白区左翼文艺运动的联系，并对新形势下文化运动的开展进行指导。他在瑞金同杨尚昆商量，要将苏区的宣传鼓动工作来一个改变，准备召开一次中央苏区宣传工作会议。为此，杨尚昆写了《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一文，经张闻天审阅后在1933年2月4日出版的苏区《斗争》第二期上发表。对于戏剧运动，张闻天在1932年11月发表的《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强调，应“充分的应用”戏剧这种形式，“图画、唱歌以及戏剧等的宣传鼓动的方式，事实上已经证明更为群众所欢迎，更能吸引广大群众，然而我们并没有把这些方法充分的应用”。他认为中央苏区文艺运动中出现的蓝衫团戏剧，应“给以充分的领导与帮助”，指出“蓝衫团的戏剧虽是已经证明是最适合于广大工人群众需要的东西，每次的上演可以吸引几百几千工人参加，然而我们却让其自生自灭，没有给以充分的领导与帮助。”杨尚昆也认为，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方式太简单太狭窄了，缺点之一是“化装讲演、话报、蓝衫团戏剧等，都还只是部分的开始采用”；对“化装讲演、活报、戏剧等是广大群众最能了解、最富兴趣的宣传方式，虽然有的地方，已经部分的开始，然而内容还需大大的改善，使它更通俗，更适合于群众的需要”。

从红四军召开古田会议到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是中央苏区文艺的成长时期。随着红军的迅速壮大，根据地的日益巩固和扩大，土地革命的逐渐深入，中国共产党对文化艺术宣传工作的更加重视、要求更高，文艺活动的开展比较广泛、比较活跃。1931年，爱好戏剧的李伯钊、沙可夫、胡底、钱壮飞等相继进入中央苏区，领导宣传工作的张闻天、杨尚昆大力提倡，使文艺运动在中央苏区日益开展起来。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新的形势下，文化运动特别是戏剧运动更进一步得到发展。杨尚昆的文章发表后一个来月，蓝衫剧团和蓝衫剧团学校在瑞金的中央工农剧社成立，至1933年，中央苏区各省、各县都相继成立蓝衫团（也有的称新剧团），广泛开展演出

活动。

瞿秋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对中央苏区的文化运动和文化建设起了直接领导的重要作用，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身为中央工农兵民主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于1934年2月初从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领导中央苏区的文化工作。他不但提出“大众文艺”运动的方向，还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文艺政策和法规，使文艺沿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方向健康发展。1934年4月，他为中央苏区审定《苏维埃剧团组织法》、《工农剧社简章》、《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和《俱乐部纲要》，6月颁布《俱乐部的组织与工作》，9月颁布《儿童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等，从而使中央苏区的文化运动逐步走上群众化、组织化、革命化的正确道路。根据大众化的文艺思想，他提出“话剧要大众化、通俗化，采取多样形式，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赵品三：《秋白同志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话剧工作》）；他提议把“蓝衫剧团学校”改为“高尔基戏剧学校”，说“高尔基的文艺是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在高尔基戏剧学校讨论教学计划时，他提出“学校要附设剧团，要到火线上去巡回表演，鼓励士气；平时要按集期（当街）到集上去流动演出，保持和群众的密切联系，搜集创作素材”（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凡剧本，没有经过预演是不可以肯定好坏的，剧本的成功，必须经过写和预演两步程序，演一次改一次，才有好的剧本产生”（赵品三：《秋白同志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话剧工作》）。这对中央苏区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瞿秋白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到斗争最尖锐的地方去，与群众密切联系，体验生活，指出“闭门造车是不能创造出大众化的艺术来的”（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没有丰富的社会体验，就不可能产生好的作品。高尔基就有极其丰富的社会体验，所以他的作品质量很高”（赵品三：《秋白同志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话剧工作》）。对此，他身体力行，曾几次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了解苏区建设和群众生活状况，体验生活，并订出自己的创作计划。他还

发动和鼓励工农剧社社员进行集体创作，说“我们没有作家、戏剧家和作曲家，但我们可以搞集体创作，可以向山歌、民歌学习，把群众中的东西记录下来……”（赵品三：《秋白同志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话剧工作》）；“民间歌曲，对群众的教育更大，由于歌词是发自群众肺腑的心声，内容通俗易懂，好听好唱，所以更受群众欢迎”（庄东晓：《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为了帮助大家写剧本，他把自己写的很多故事，交给剧社的同志编成剧本。中央苏区的文艺工作者在瞿秋白号召和领导下，深入斗争生活，向民间艺术学习，大搞集体创作，大大繁荣了苏区的文学艺术。1934年5月，在他主持下创办《苏维埃文化》月刊，第一期发表他的《文化战线的红五月》、李伯钊的剧本《无论如何要胜利》、散文《春耕戏杂记》（戈丽）等。《苏维埃文化》的创刊，对繁荣苏区的文艺创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徐特立和沙可夫在瞿秋白到瑞金之前，一直具体主持教育部的工作，教育部设艺术局领导苏区的文化艺术工作。他们对中央苏区的文艺工作也做出了很大贡献，除审定印发各种文艺工作条例、纲要、组织法外，还出版《竞争游戏》、《少先队游戏》、《儿童歌唱集》等。徐特立在代教育部长期间，还亲自编写《自然常识》、《农业常识》，出版供干部教育用。

二

在群众性戏剧运动蓬勃开展的基础上，中央苏区出现了专业化剧团。中央苏区建立的第一个专业化剧团是红军学校的八一剧团。八一剧团于1931年12月底在红五军团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时诞生。当时红军学校从事戏剧的人员得到扩充，主要有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的女知识分子崔音波（小提琴家）、石淡峰（演员），有石联星、彭舜华，刘月华、施英、施月娥、施月霞、施月仙、蔡乾、贾耀德和沈乙庚等。学校政治部主任欧阳钦非常重视，组织剧